



200年前如皋痧疫大流行

□程太和

“痧”，中医指霍乱、中暑等急性病。“疫”，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如皋县志》、同治十二年(1873年)《如皋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如皋县志》均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二年(1822年)如皋痧疫大流行的记载，内容为：痧疫流行，伤人甚众。究竟死亡多少人，因缺乏当时统计资料，难以说清。2007年11月出版的《掘港镇志》(时掘港属如皋县管辖)“大事记”有这样的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夏、秋，连续发生瘟疫，每日有数十人死亡。”掘港一地每日有数十人死亡，可以推测当时如皋全县有多少人死亡。如皋籍人士胡杰(字云溪)著有《痧疫论》一书。此书成书于道光三年(1823年)。胡氏鉴于嘉庆庚辰至道光辛巳、壬午连续三年(1820—1822年)如皋痧疫大流行，“伤人甚众”。于是在重刊王凯编撰《痧疫全书》(痧症专著，共三卷。清·王凯编撰。书成于1686年。原序称“深山野人”林森曾向王氏面授《痧书》，复经王氏综合古今有关文献结合个人见闻编成此书。全书详细论述痧原、辨证、治法、用药大法、多种痧症证治及治疗方剂等)的同时，自著《痧疫论》。胡杰《痧疫论》，首先是“痧”与“疫”分论：其论“痧”，以“绞肠痧”为主；论“疫”，则引用李东垣、张景岳、吴又可诸家之说，指出“疫症繁多，痧乃疫中之一”。根据如皋痧疫大流行的特点，胡杰主张内外并治，提出不分缓急，皆宜急治，以辛通窍，以香逐秽，破瘀消积，探吐取嚏，推拿刮放，灸关元等医疗原则和医疗见解。书中所列外治诸法，都具有临床参考采用的价值。如皋现藏之木刻本是其原版。

老建筑

鸿雪轩照相馆

□清 歌

说起鸿雪轩，喜好旧书的人都知道《鸿雪轩尺牋》，著者龚未斋(1738—1811)，字蓼，号雪鸿，绍兴师爷。不知何故，清末至民国，不少地方的照相馆取名鸿雪轩。其中如皋鸿雪轩照相馆，历史悠久，创办于清末光绪年间。当时邻近如皋的泰兴等地，尚无照相馆。

程太和撰有《清末民初如城居民爱好拍照》(刊于2017年11月23日《南通日报》)和《百年前如皋的照相馆》(刊于2020年11月17日《南通日报》)。两篇作品同文异名，均有记述，鸿雪轩照相馆是如皋历史上第一家照相馆。其实不然，查阅周思璋《照相史话》，1904年，暂住在如皋关帝庙内的卢姓小道士，买来一架小照相机，携带其妹，于花园巷内开设了如皋最早的照相馆——美如英照相馆。1908年，镇江市蔡星甫(蔡文辉)、蔡少甫父子才在关帝庙创办了鸿雪轩照相馆。起初，蔡星甫跟随李和甫学习摄影技术。鸿雪轩照相馆开办后，蔡氏父子苦心钻研，照相生意日渐兴隆。1914年，鸿雪轩照相馆迁至范家桥西首，建造了玻璃摄影棚。正如程文引用是年《如皋白话报》中的广告：“鸿雪轩照相，武庙(关帝庙)内蔡君星甫摄影手术绝妙，久已驰名。近来在家宅内建筑玻璃房，仿上海形式，配定光线。凡内眷拍照，尤觉称便。”所谓“上海形式”，不仅是玻璃摄影棚，还指蔡老板从上海购来一辆自行车，可以用来拍照，也可以用来出行。由此鸿雪轩照相馆名声大噪，超越美如英照相馆。

1935年，蔡星甫去世，蔡少甫继续经营照相馆。1947年，蔡家迁往杭州谋生，只留下蔡少甫的二子蔡荫宗继续经营此店。照相馆当然要用电，笔者所见如皋如电灯公司1947年4月上半月收费存根，编号为00510号，正文显示：鸿雪轩于是年4月15日缴纳电费为27600元，用电度数6度，上次抄录为498度，现在抄录为504度。收据右上侧有电灯公司铃印，可见“皋”等字。这份小小的收据，见证了鸿雪轩照相馆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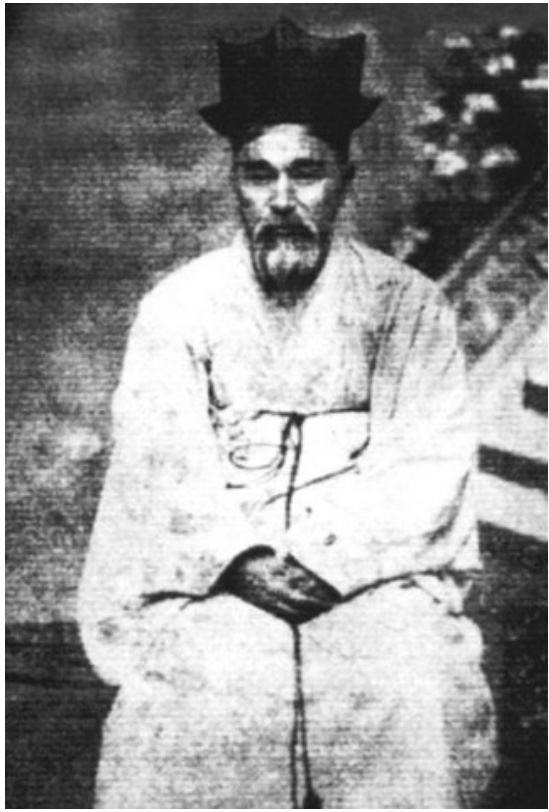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金沧江：流亡南通的韩国爱国诗人

□杨 丽



金沧江像



1907年，寓通的金沧江(后排左二)与地方文士在通城北郊合影



金沧江(1850—1927)，原名金泽荣。韩国著名爱国诗人，李氏王朝后期四大文豪之一，被誉为韩国的屈原。他与张謇诗文交往34年，旅通22年，著有《韶漫堂集》等。

金沧江生于哲宗庚戌年(1850)，是“花开金氏”的第二十代孙。金的始祖是文僖公金仁瑬，为晋阳牧花开县人。金仁瑬的第四代后人金勋，谥号文节公，自号梅轩，高丽恭悯王代时做太子詹事。高丽灭亡后，隐居在开城万寿山县陵附近，自称高丽遗民。金沧江本人也以高丽遗民自居。

1882年，汉城壬午军乱，清政府出兵平乱，张謇随吴长庆军来到朝鲜。金沧江通过金允植与张謇兄弟相识，1883年，金沧江有《赠张季直》“送汝麟阁高崔嵬，我且担簦揖通街。不然渔樵结伴侣，天台之下潇湘隈。”(《沧江稿》卷二)表达友谊。同年金沧江编撰《嵩阳耆旧集》。

1887年，金沧江38岁被派往中

国时曾想拜访张謇，因母亲病故急返回国，未能成行。1891年，他考取了司马试。时任总理大臣的金弘集刊了金沧江所编撰的《嵩阳耆旧集》后，欣赏金沧江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才华，1894年提拔他担任议政府的编史局主事。

金沧江性情耿直，青年时期仕途曲折。1895年，他被提为内阁主事，同年秋升至中枢院参书官兼内阁记录史籍课长。1896年，担任大行王后挽章制述官。1901年升至六品官承训郎，1902年连任惠民院主事，1903年升至正三品通政大夫弘文馆纂辑所文献备考续撰委员。在此期间，金沧江编撰了《东史辑略》。

1905年，日本悍然在汉城建立宪兵司令部。金沧江悲愤不已，辞去官职流亡海外。同年10月7日，金沧江从仁川港出发到了上海。离别祖国时赋《九日发船作二首》，其一：“东来杀气肆阴奸，谋国何人济此艰。落日浮云千里色，几回首望三山。”三山指汉阳的三角山，祖国如落日浮云，河山尽落日寇之手，抒发了满腔的悲愤。该年，他还编撰了《历史辑略》，表达对祖国深深的眷恋。

到上海后，他曾于10月14日搭小轮船前往苏州，投奔友人未果。在上海

十余天后，10月下旬前往大生驻沪事务所请见张謇。张謇不仅热情接待，而且为他做长远打算，希望金沧江出任沪报社主笔，但金沧江希望旅居南通。张謇即安排他到南通翰墨林书局做编校。10月30日，金沧江一家乘船前往南通。

张謇帮金沧江在城中西南营处安了家，郑寅普记载其办公的地方“房间备有桌椅，右边是一望无际、碧绿清澈的湖水(注：应是濠河之水)，湖里莲花盛开”。他在通期间，先后出版了《韩史纂六卷》《韩国历代小史》《韶漫堂集十五卷附刊一卷》以及编辑的《丽韩十家文钞》。此外还出版有朴趾源的《重编朴燕岩先生文集》、黄玔的《梅泉集》。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在南通翰墨林书局印出。

金沧江与张謇情趣相投，私交甚笃，在通期间，常相携徜徉山水，诗文唱和甚多。张謇曾作《沧江示所和诗复有赠》：“爱客攻吾短，论诗数尔强。时时惊破的，炯炯达升堂。蜡屐吟山出，蜗庐借树藏。众人怜寓卫，后世有知杨。”1924年，张謇有《视沧江病》：“闻病抛诗叟，来探借树亭。填栖书榻烧，烧炕柚连扁。扶掖怜参术，荒寒满户庭。余年犹兀兀，史笔耿丹青。”盛赞其暮年仍旧秉笔直书。

金沧江在通22年，虽语言不通，但

通过笔谈，结交的人士很多。他与南通的陈武臣、万跃西、陈修定、陈曙光、费范九等多有交往，与严复、俞樾、梁启超等也有联系。徐贯恂先生在其身后作有《初识韩金沧江先生赋》：“浮云落日促行舟(金去国诗有‘落日浮云千里色’句)，异国俞张气可投。一代史编全土窟，百年王室破金瓯。黄魂唤醒葛苏士，白发歌残郑梦周。笑指五山干净土，只堪埋骨不埋愁。”

1926年8月24日，张謇先生逝世，金沧江深感哀痛，带病前往吊唁，并作挽联：“等霸期王负才俊，应龙飞处一声雷，纵无邓禹奇功在，足试瞿星活手来；昌黎云与孟郊乐，文字狂欢卅载中，今日都来成一错，奈何淮月奈江风。”

张謇与金沧江，一个是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一个是朝鲜李氏王朝后期的四大文豪之一，他们从1882年在汉城相识，1905年金沧江离国投奔张謇，前后交往34年。张謇去世后，金沧江归国无望的孤寂与日俱增。晚年，金沧江的三子先后离世。绝望夹杂着时局战火的煎熬，他最终没有等到祖国光复的那天。1927年3月20日，78岁的金沧江选择了诀别人世。他的遗骨被安葬于狼山之上，与青山长伴。

关于陈才福的若干史实补遗

□羌松延



近阅李元冲先生《海门抗日史上的两次“木马计”》一文(刊于6月2日《南通日报》“城市记忆”专版)，该文以抗战时期陈才福、汤景延“假投降”的不同结果，分析并将成败归于共产党积极抗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等因，读后颇受启发。但文中有关陈才福的部分记述，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似有出入或遗漏。有必要就此作简要补充，兼与李元冲先生商榷。

一、关于陈才福“假投降”之成败

陈才福，原名陈志仁，1898年生于川港的一户农家，行三。陈于青年时期随父赴沪，却游荡街头，后拜黄金荣得意门徒、青帮卢英为“老头子”，因在帮会中排行老四，人唤“陈阿四”。上世纪30年代初，卢英任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时，陈系其手下的一名领班(即探长)。1932年10月，陈才福在干干时被王某“号召其左右花会赌徒等十余人将左目殴伤，又戳伤手腕……公安局当将陈送医院医治，断得眼目恐致失明”。失明后，陈得外号“陈瞎子”。有史料显示，从警期间，陈才福曾屡破贩毒、绑架等案，但因其荼毒市民，也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又有了绰号：“强盗阿四”。

1938年日军占领南通后约两个多月，陈才福“愤发地把在沪所有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变卖后奔回他的老家”，“邀集同志朱铁三、鲍济民等从事肇画，筹款购械，队伍于焉成立。从此，时与日军周旋。大小数百战，未尝稍却”。

为了打击日军，初由“陈才福和张能忍(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长)商定，陈才福派一个大队配合张能忍部高文星中队向日军假投降”。据日军《步兵第八十一联队志》记载：“进入昭和十四年(1939)2月以后，根据地在通海镇的改实力部队(约三千人)司令陈才福通过特务机关向

我军申请归顺……阅兵式于3月25日在海门进行，河野中队长进行了阅兵。此后，陈部队在海门地区各警备队的兵舍附近配置了日军3—5倍的兵力。”

降日后的陈才福“用他那吹拍手段，骗取鬼子信任”。根据双方约定，陈部队的归顺仪式预定在4月12日举行。结果，陈就利用这一天反戈一击，收复海门。1939年4月15日上海《时报》曾以《陈才福部计取海门》为题，作出详细报道：

苏北六县联军总指挥官陈才福，设计伴与妥协，即将有力部队深入日军所占据之腹地，于本月十二日午刻，陈氏故意在海门日军特务机关宴请日方长官宾本三郎，苏北警备司令松浦、队长久留、主任菅尾，南通特务机关长、海门班大上司泰田荣等不下一百余人。席间突由陈氏一声暗号，与乔装送礼夫役之陈氏宪兵队(即敢死队)互相呼应，内外夹击，于二小时中，即将百余名之日军官及大小汉奸扫数歼灭。同时，各地驻军，大举总攻，海门遂于昨晨克复。

几乎与此同时，在陈才福的精心策划下，该部其他武装血战两昼夜，分别进攻了通海沿线多个日军据点。据4月14日《时报》报道，海门县“盘踞电灯公司之日军二十余名，全数为陈部歼灭，夺获步枪十八支，子弹二千余发。大储栈击毙日军不少四名，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海门中学之日军，经陈部反复冲杀五次，毙日军廿五名，获步枪十七支，轻机枪一架”。

南通境内，陈部当天在川港镇“毙日军十三名，获步枪六支及零星文件”。小海之战，因日军在此“筑有坚强之防御工事”而未能入手，“仅击毙日军官一名，士兵一名，夺获步枪八支”。张芝山镇向无日军，惟有日伪警卅余名……全数为陈部击毙。”此外，陈部盒炮队一班在配合张能忍部之二营围攻八厂日军时，“冲入厂门，立毙日军四名。旋为通城日军部得报，开一卡车驰救，突遭陈部敢死队迎头痛击，卡车翻入河中，计毙日军廿余

名，其余军用品甚夥。”

关于这次事件，查阅日方《步兵第八十一联队志》中《海门地区战斗》文，该文记述虽与华方不尽一致，但其内容显示，此战确给日军造成了重击。

综上所述，“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的陈才福部，在通海沿线发起的这次反击，似不该简单以“彻底失败”作结论。

二、关于国民党的“袖手旁观”

对于此一“木马计”中的陈才福，国民党是否不闻不问、袖手旁观了呢？有两则史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一是当陈才福投降日军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方面立刻通过上海《导报》等平台，公开斥责陈“受日方及汉奸之诱惑，遽尔变节”。江苏省府更是对陈才福予以悬赏通缉。此举不管是否为假戏真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行动都是一种配合。

二是在由陈才福策划的这次系列反击作战结束后，上海、重庆等地各大报纸曾及时报道此事。同时，经陈才福上司、国民党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李明杨转报，陈才福还获得了国民政府军委会嘉奖：“常备第二团长陈才福，假降克成大功，蒋总裁闻悉，特颁给陈才福华胄膏章，用筹忠尽，陈才福部在事出力官兵，特给奖金一千元以上，以资激励。”一时之间，陈才福抗日英雄的美名传遍四方。此时的陈才福，堪称其人生中最辉煌、高光时刻。

三、关于陈才福“遭迫害遇害”

至于文中所述“陈才福遭到(日军)追杀，于1940年初在泰兴遇害”，该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

年龄稍长些的读者大多看过一部老电影《东进序曲》，片中只身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和搞笑的反面角色、流氓司令贺老五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这两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时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与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六纵队司令陈才福。在关于新四军东进的史料中，陈才福是一个绕不开的“著名人物”，连

粟裕、陈同生也有文字述及到他。

1940年5月17日，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郭村。此后，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要郭村。6月下旬，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竟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郭村原为陈才福的防地，他经常向李长江要求把挺进纵队赶走。甚至夸口：“新四军一共才两千，我去大叫三声也把他们叫垮了！”

陈才福不光嘴上嚷嚷，在战场上更是一员反共大将。几天之后(28日)的拂晓，郭村战斗打响，陈才福部担任主攻。战斗持续数日，陈才福与四纵陈中柱及手下三千官兵却被我军俘获。最终是陈毅“叫人把活捉的陈中柱、陈才福押上来松绑……给李明杨带回去”。

据资料记载，“约在南昌失守以后，蒋介石即密令留在京沪杭地区的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李明杨部队投敌，以确保京沪地区的反动势力”。1941年2月13日，李明杨之心腹“李长江率部投降日寇……不久即成立了伪军第×军，辖二十一、二十六两个师”，陈才福为二十六师师长，师部驻海安。

关于陈才福此后的去向也有记载，如：1943年初，“伪军头目陈才福除了派出伪军第26师部分兵力袭抗联抗部队所驻的中心区外，还在交通线上到处修筑据点，妄图切断联抗部队与友邻部队的联系”。1944年1月7日，“新四军黄克诚部袭击在江苏海安县抢掠的伪军陈才福部，毙伤连长以下30余人”。抗战胜利后，陈才福所部共计五千左右接受李天霞的国民党第一〇〇军编点，陈被任命为该军少将高参兼突击队队长。抗战期间的陈才福，历经从抗日英雄到汉奸的角色反转，但其反共急先锋的形象从未改变。

对于陈才福的死亡时间及原因，此前未见有关信息。经寻访，才从陈的长子口中得知：1945年秋，陈子就读省中(今南通中学)，始由乡下住进了其父南接北公园、西濒濠河的“西南城墙脚33号”私宅。次年，身患糖尿病的陈才福由海安回通城休养治疗，数月后去世。循此线索，笔者终在1946年12月9日《五山日报》找到答案：“陈才福前晚因病逝于本城寓邸”。